

# 伊朗中产阶级的形成与“立宪革命”\*

张 超\*\*

**内容提要** 伊朗社会中巴扎商人、作坊主和乌莱玛是城市中产阶级，其人数比例虽然不大，但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很强的组织性，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方入侵和经济渗透，伊朗现代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同时，西方文明的传播及现代教育的出现促使现代中产阶级产生。两类中产阶级都要求改革和独立，他们联手发动立宪革命，建立议会民主制政府，但议会政治下立宪政府无法驾驭内外交困的局面。伊朗社会结构仍是前现代的，中产阶级无法与强大的保守力量相抗衡，外部力量的干预最终导致立宪革命失败，但中产阶级的政治架构对伊朗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伊朗 中产阶级 立宪革命 政治转型

社会史既是中东区域研究中的重点之一，也是国内外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的领域。然而，在目前中东社会史的相关成果中，对中产阶级的专题研究较为薄弱。中产阶级是中东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一战以来，中东地区不少民族国家在形成或独立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中产阶级的兴起及其社会运动。20年代土耳其建国、伊朗礼萨汗政权的建立以及50年代和60年代从阿尔及利亚到伊拉克的诸阿拉伯国家的形成，无不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和传统的地主精英地位的衰落。<sup>①</sup> 中产阶级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

---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项目号：15ZDA033）的阶段性成果。

\*\* 张超，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① James A. Bill and Carl Leiden,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5, p. 80.

力量。2010年中东变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教育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使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得到强化,素质有所提高,组织性增强”。<sup>①</sup>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约旦、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家。<sup>②</sup>这是后冷战时代民主化浪潮推动的结果,其目标是结束威权统治和争取民主、平等、外交独立等,它是当地民众经历阿拉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后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sup>③</sup>由此可见,变革是中东社会当前和未来的主要议题之一。为更加有效地把握中东社会的变化及发展趋势,对中产阶级的构成和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中产阶级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关于其内部的构成,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马克思将位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所有集团,如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农民、医生、律师和学者等群体都称为中产阶级。<sup>④</sup>1951年米尔斯第一次提出“白领工人”的概念,其主要由经理和专业人员组成,充当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缓冲。<sup>⑤</sup>这一概念被社会学界广泛引用,学者们把那些拥有专业技能、能够在获得劳动报酬之外获取“租金”收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在社会上享有一定“自治”地位及权利的群体称为中产阶级。<sup>⑥</sup>中国学者对中产阶级定义是:以脑力劳动为主,有较高收入和较好工作环境,具备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对其工作对象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意识、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sup>⑦</sup>

以上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以生产关系为基准,将特定的社会群体划为中产阶级,中国学者以特征性的描述对中产阶级概念进一步明确化,中产阶级的概念逐渐明晰。研究中东问题的中国学者认为中东社会中产阶级包

① 黄民兴:《世纪震荡: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原因和前景》,《回族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黄民兴:《世纪震荡: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原因和前景》,《回族研究》2011年第3期。

③ 黄民兴:《世纪震荡: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原因和前景》,《回族研究》2011年第3期。

④ 见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363页。

⑤ [美]C. 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67页。

⑥ Farhad Numani, Sohrab Behdad, *Class and Labor in Iran: Did the Revolution Matter?*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0.

⑦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36页。

括商人、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政府职员、军官和知识分子等。<sup>①</sup> 笔者以伊朗为典型案例,认为伊朗中产阶级包括巴扎商人、作坊主、中下层乌莱玛、中下级官员和军官、中小地主等构成的传统中产阶级以及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现代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伊朗现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现代伊朗政治舞台上多次出现中产阶级的身影,但还没有关于它的专题研究。笔者试图以恺加王朝晚期为重点,追寻伊朗中产阶级的早期形成过程,进而对伊朗前现代的社会结构演变及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和社会地位进行初步探讨,并对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做出客观评价。

## 一 伊朗前现代的社会结构

### (一) 20世纪初伊朗的经济概况和社会结构

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20世纪20年代以前伊朗社会处于以农牧业经济为主的前现代阶段。从经济结构来看,伊朗9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其余10%的劳动力从事商业、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等行业。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80%~90%,小规模工矿企业及商业构成国民收入的10%~20%。<sup>②</sup> 由于伊朗农村土地归外乡地主所有,农业长期缺乏投资,生产条件恶化,农业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鲁尔斯坦、库尔德斯坦、扎格罗斯山区存在强大的游牧部落,游牧区与定居的农耕地区交错,农民和牧民间因土地和水源的竞争时常发生冲突。此外,英伊石油公司的经济活动与伊朗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几乎是隔绝的。英伊石油公司对伊朗当地资金、产品、劳务、管理人才等方面的需求极小,公司也从不向当地提供石油产品、借贷等金融业务,更没有帮助伊朗建立银行、保险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举措。<sup>③</sup> 公司也没有帮助伊朗建立起石油下游产业如石化、炼油等工业。因此,伊朗虽拥有原材料、廉价劳动力、良好的投资环境,但未产生现代工业。

① 王铁铮:《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三秦出版社,1997,第105页。

② Julian Bhari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ran 1900 - 19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5.

③ Jahangir Amuzegar, *Iran-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Dualistic Con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p. 23 - 28.

20世纪初伊朗95%的人口是文盲，除了宗教学校外，全国只有21所初中和1所高中。<sup>①</sup> 20世纪20年代以前伊朗农村人口增长率很低，平均每年仅为0.75%。人民的生活水平处在最基本的温饱线上，由于交通匮乏、物流落后，常有饥馑。

从人口结构来看，20世纪初伊朗总人口为986万，其中779万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9%，这包括了247万牧民，占总人口的25%。农村人口分散，全国总共有村庄15200座，53%的村庄居民人数都在340人以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1%，城市人口分布于全国100个城市（5000人以上），其中最大的城市有德黑兰、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还有7个超过5万人的城市，其他90个城市规模都不大。<sup>②</sup>

伊朗传统社会大体分为游牧社会、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三大部分，其内部都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村庄、部落和市区都是封闭的、自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社会实体。各实体有很强的独立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较少。

1. 游牧部落的社会结构。在伊朗的游牧部落中，最小的单位是氏族，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牧民组成，氏族的大小规模依地形条件而定，从10户到100户大小不等。氏族头领即卡达胡达（Kadkhudes）或赛非德（Rish Safids），前者由本族人推选，由政府正式任命，而后者是没有经过正式任命的代理性地方长官。卡达胡达和赛非德的职能是解决其管辖范围内的水源和土地等争端，他们都是本族利益的保护者和内部事务的仲裁者，对外也是本族的代表人物。卡达胡达和赛非德拥有广泛的权力和相当高的权威，他们有能力将本族的财富和人力组合起来，氏族是有管理功能的和具权威性的社会实体，也是等级性的、分层化的群体组织。

比氏族高一级的是胞族（Tayifeh），通常都由几个氏族组成，胞族首领称“汗”（Khan）或“卡兰塔”（Kalantar），二者的职能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类似卡达胡达和赛非德。比胞族更高一级即第三级的游牧组织是部落，其结构和胞族的结构类似，例如巴赫蒂亚尔部落有55个胞族、恺什恰依部

① Julian Bhari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ran 1900 - 19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5.

② Julian Bhari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ran 1900 - 19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5.

落有30个胞族(称Tireh)、玛马萨尼部落有4个胞族、波伊尔·阿赫摩迪斯部落有2个胞族,卢尔地区的库尔德部落有6个胞族(其首领称Agha)、俾路支部落有12个胞族(其首领称Sardar)、阿拉伯部落有30个胞族。<sup>①</sup>

部落首领的角色和职能类似于胞族的汗或卡兰塔,他们不但要出身名门还要具备相应的治理才能,要保护本部落免受政府苛捐杂税的征敛,还有免于其他部落的侵害。部落首领的牙帐(Darbar)本身就是法庭,战时部落首领充任将军,平时他掌管外交和处理内部事务,如分配土地、带领族人迁徙、解决内部纠纷等,此外他还有维持本部落的文化认同的职能。恺加、巴赫蒂亚尔、恺什恰依等部落都有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即部落联盟,部落联盟内都有最高权威,联盟的最高首领称伊利可汗,由部落首领推选产生,并经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与伊利可汗平职的是暂时的代理可汗,称“伊利伯”(Ilbeg)。

2. 伊朗农村的社会结构。伊朗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和牧民的部落结构相似。在库尔德、俾路支、卢尔等地区的农村,农民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牧民定居而来,因此保留了部落式的关系,他们虽然放弃了游牧生活,但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仍维持了部落的组织形态。西阿塞拜疆地区定居的库尔德人有15个部落,分为75个胞族约合900个氏族,定居的农村公社组织仍类似于部落。而世代相传的农民与之不同,这些农民以村落的形态聚居,同样也是自足的、自治的群体,可以称之为村社。其长官也称卡达胡达,负责自治社区即村社的事务,当地的长官都从本村社的地主中推选出来。卡达胡达的名称是从游牧民社会借用而来。比较大的村社长官日常政务由萨非德辅佐处理,此外还有专职的科员分掌具体事务,如裴卡尔(paykar)是执行官;达斯塔班(dastban)是财税官,掌管土地、收成、农畜和防务;米拉布(mirab)负责水利。

伊朗多数村庄整个属于部落酋长、领主、大地主、王室等统治精英的私有财产,也有很多村庄属于宗教地产瓦克夫。外乡地主给村庄提供监护,包括政治保护,还有维修水利设施、提供农种等,因而在农产品的分成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村社实行生产资料共享,村社成员采用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耕犁队(boneh)是农村公社中强有力的组织,负责村社的主要经

<sup>①</sup>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9.

济活动，在农村的生产和分配等经济活动中起着决定作用。村社农产品分配采用的是一种分成制形式，按照人力、畜力、农种、水、地等五大要素在农户和地主间进行分成。产品消费方面，因为村民有共同的消费支出份额，因而在共同缴付政府赋税和支付手工业必需品之后，农产品才按照贡献大小进行分成。那些缺乏生产资料的村庄通常都归外乡地主所有。地主有专门收租的代理人，称之为拜利夫（bailiff 或 mubasher）。地租在伊朗被视为地主的分成，地主分得较大的份额，且地主还控制着城乡间的农产品贸易，因而在伊朗经济中占据支配性的地位。

在 20 世纪下半叶之前农民大多属于这种分成制的成员，村社成员内部形成了牢固的联系，而在游牧部落地区的村社还会因为家族关系更为紧密。伊朗大部分地区自然降雨稀少，耕地中只有约 1/3 为水浇地，其他为旱地，农业用水严重依赖人工水利即坎儿井。地下水是稀缺资源，因而伊朗村庄都依水而建。只有大地主能够修建或担负坎儿井的维护费用，因而大地主垄断着地下水资源。水的分配和使用制度是农村社会得以稳定的传统纽带之一。<sup>①</sup>

3. 伊朗城市社会的结构。伊朗城市社会是按照城市的区划进行组织管理的，市区长官也称卡达胡达，由萨非德推举产生，其职能和角色与部落的卡达胡达相似。但由于城市居民有不少属于社会中上层，有部落酋长、高级乌莱玛（如穆智台希德）、富商等群体，还有地位显赫的家族定居，因而城市的行政管理更加复杂。卡达胡达之下有政务官瓦里斯、教区监护人谢赫伊斯兰（shaykh al-islam）或杰玛耶赫（jom'eh al-islam）、监察官卡兰塔、水利官米拉布、法官莫巴沙尔（mobashar）等官员分管城市政务。城市社会中的不同群体都有各自活动的场所，如清真寺、茶坊、公共浴室、剧院和体育场等。

伊朗城市的职业组织是行会（Asnaf）。手工业行会都由会长负责（也称“卡达胡达”，由“萨非德”推荐）。行会有特殊的行规、仪式和礼节，行会组织本身是相对封闭的社团组织，成员只进入属于本行会的公共场所。

城市下层还有帮派（luti）组织。帮派受到各种政治和社会派系的支

<sup>①</sup> Keith Melachlan, *The Neglected Garden-The Politics and Ecology of Agriculture in Iran*, London, 1988, pp. 94 - 95.

持,参与征收宗教税、保护费的日常事务,起着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是一种非官方力量。帮派起源于农村,起初地方贵族与其他贵族间常发生利益冲突,地方贵族就动员他的领地上的农户去解决纠纷,这是伊朗城市帮派的来源。<sup>①</sup>帮派领袖热心于提高自己的社会威望,取得政治或宗教领袖的支持。帮派是城市下层居民的组织,在城市中以表演和娱乐行当谋生,成员具有农民家庭背景。帮派领袖从帮派中选出搏击健将来扩充武力,他们依靠武力成为地方豪强。此外帮派领袖还以帮规、荣誉、道德来约束成员的行为,他们充当着城市中各社区的保护人,法律对他们的约束很小。

帮派和乌莱玛、巴扎商人都有密切联系。乌莱玛向帮派提供政治保护,常利用帮派表达其政治立场,以此达到对政府施压的目的。帮派领袖则向宗教领袖捐赠财物。帮派在城市中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团体的利益,通过声援政治或宗教派别的示威参与政治运动。帮派反对地方当局对其施加的限制,如果他们与地方政府有共同利益他们会选择支持后者。现代化进程开始以后,国家权力不断扩张,帮派逐渐衰落,国王常动员军队扮成农民来应对宗教或政治反对派的抗议。<sup>②</sup>

## (二) 社会群体的封闭、分散和内争

伊朗国内的地理分隔、民族差别、语言差异和教派分立等因素强化了社会群体的分散性。

伊朗地形地貌非常复杂,缺少可以航行的河流,并且城市间道路遥远难行,沿途常遭部落袭扰,加上交通状况落后,中央政府的权威很难达到边远省区,各地基本上都处在地方政府、豪强地主、部落首领的支配下,各地村庄、部落和城镇是相互孤立的。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城乡间的交流有所加强,但是伊朗各地孤立和分散的格局仍难以改变。例如19世纪建成了德黑兰至大不里士的公路,但沿途经济却没有发展起来,其原因是交通的改善也方便了政府向地方征税。政府的横征暴敛迫使沿线居民迁往偏远的山区,交通干线一带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村庄

① Stephen C. Poulson, *Social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Iran Culture, Ideology, and Mobilizing Framework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 69.

② Stephen C. Poulson, *Social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Iran Culture, Ideology, and Mobilizing Framework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 71.

被遗弃，因此“波斯较为富裕的村庄一般位于离交通线远的、不易于被人发现的山沟中”。<sup>①</sup> 只有那些能免于政府重税和游牧部落洗劫的农村才能繁荣起来。

除了地理因素外，民族成分复杂、语言不通成为社会群体间交流的一大障碍，这是造成伊朗各地分散孤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语言方面来讲，中央高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大多操波斯语，而农村人口中有操波斯语，以及卢尔、亚美尼亚、巴赫蒂亚尔等语言的居民；游牧部落里有巴赫蒂亚尔、恺什恰依、俾路支、阿拉伯、玛马萨尼等语言各异的民族。在里海沿岸的省份，农村人口中主要有操吉拉克、塔拉什、马赞达兰等语言的居民；而城市人口中主要是操波斯语和阿兹尔语的居民；部落牧民有操库尔德、土库曼等突厥语的民族。伊朗西部省份有操库尔德、卢尔、阿拉伯等语言的部落民；农村有操阿夫沙尔、阿兹尔、波斯、巴亚提、古拉尼、亚述等语言的居民。<sup>②</sup> 东南和东北省份的民族成分也相当复杂。

宗教派系的不同也使得伊朗社会群体差别更加复杂化。1900年，伊朗85%的人口属于什叶派，几乎所有的伊朗城市的什叶派居民区都分为尼玛提(Nimats)和海达里(Haydaris)两种类型的教区(mahallat)。逊尼派占将近10%，包括俾路支人、土库曼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逊尼派分布于中央高原周围的库尔德、土库曼、阿拉伯、俾路支、哈拉尔等民族的部落里。非穆斯林占5%，巴哈伊教徒分布于亚兹德、设拉子、伊斯法罕和纳加法巴德，亚述基督徒分布于乌尔米耶，亚美尼亚人分布于伊斯法罕、拉什特、德黑兰和阿塞拜疆。犹太人分布于亚兹德、设拉子、德黑兰、伊斯法罕和哈马丹，祆教徒分布于亚兹德、克尔曼、德黑兰和伊斯法罕。<sup>③</sup>

社会群体内部矛盾重重，充满利益冲突。小到氏族之间，大到部落之间都充满了矛盾和竞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关系紧张。农村也充满矛盾冲突，当地的法官忙于解决村民之间的土地纠纷。城市居民以教区划分，他们因信仰不同互不通婚，日常活动的场所都是分离的。由于语言、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伊朗社会群体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各个社会群体很难突破上述各种因素的限制，因此无法形

①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4.

②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5.

③ 哈全安：《中东史 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 389 页。



成全国性的、跨越地域、民族和教派的阶级。

恺加王朝时期伊朗政治权力是分散的,王朝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官僚体系,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很低,各地管理松弛。由于各地交通不便,中央政令难以下达,各地的豪强、地主紧密控制着社会下层。国家统治表现出部族政治的特征,部落首领被任命为各省总督,在其封地上拥有行政、军事、税收和司法大权。伴随着部族力量的逐步扩大,部族分裂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国家的统一和王权受到威胁。<sup>①</sup>而地方豪强(主要是大地主和部落首领)也不能完全控制其管辖范围内的部落和教派群体,因此无法与中央抗衡。<sup>②</sup>恺加王朝利用部落内各家族的矛盾使他们相互牵制,以削弱潜在的对手等方法进行统治。部落首领日益向地主化、商人化和官僚化方向发展,恺加王朝以册封部落首领的方式将之纳入国家体系,以此加强对游牧部落的控制。<sup>③</sup>

宗教高层的穆智台希德(mujtaheds)只是暂时、有保留地承认现世的世俗君主的统治,他们宣称只有隐遁的伊玛目才具有政治合法性。由于恺加王朝统治者无圣族后裔的高贵血统,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面临什叶派乌莱玛的质疑,教俗矛盾逐渐显现。<sup>④</sup>王权与乌莱玛的关系微妙,二者合流时后者是政府与民众协调关系的工具,二者反目时后者则是引领民众推翻政府的革命旗手。<sup>⑤</sup>从整体政治结构来看,伊朗呈现出宗教、王权、部落多极分立的格局。

## 二 伊朗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

### (一) 前现代伊朗阶级结构

从阶级结构看,伊朗社会呈金字塔形。社会上层群体在人口结构中占比重很小,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包括王室成员、地方贵族(ayan)和豪强、部落首领(khan)、领主(tuyuldar)、大地主(malekin)、高级乌莱玛、富

① 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等著《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第158页。

② Ervand Abrahamian, "Factionalism in Iran: Political Groups in the 14th Parliament (1944 - 1946),"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4, 1978, p. 23.

③ 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395页。

④ 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390页。

⑤ 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等著《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第174页。

商 (tujjaramdeh) 等。处于金字塔中间的是各级地方长官 (kadkhudes), 还有中下层乌莱玛、中高级军官和官员、作坊主、巴扎商人、中小地主, 这也是社会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所占的比重没有准确的数据, 这一阶层大多数居住在城市。伊朗农村个体农户所占土地不到 17%, 中小地主和富农等中间阶层约占农村人口的 25%<sup>①</sup>, 占人口总数的近 20%。

前现代伊朗社会中, 城市的中间阶层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它包括乌莱玛、商人和作坊主三大阶层。伊朗传统社会的中间阶层在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 但也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很强的组织性, 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对王权构成挑战, 并迫使当局做出让步。社会运动中的领导者和主力军通常都由中间阶层的某一群体来充当。

宗教阶层是伊朗社会中的一个独特阶层。乌莱玛是由宗教学者组成的群体, 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 在前现代阶段的国家政治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是伊朗传统社会的精英群体。萨法维王朝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 从而凝聚国力, 在与信奉伊斯兰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的对抗中加强国民的国家认同, 什叶派占据国教地位。伊朗也形成了正统的什叶派教阶制度, 位于什叶派乌莱玛阶层顶端的大阿亚图拉依赖国家支持, 享有经济和政治资源及较高的社会地位。

什叶派宗教阶层在伊朗穆斯林社会日常事务中承担了管理者的角色。穆智台希德作为穆斯林的“效仿渊源”<sup>②</sup> (emulation), 其宗教指示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使伊斯兰的社会法得以执行。每个“效仿渊源”都有众多追随者, 其对信徒影响很大, 并以自己为核心各自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关系网。乌莱玛垄断了教育和司法两大领域, 承担了教育和民事司法 (shar) 及立法等功能。乌莱玛与巴扎商人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 神学院的教学经费、宗教慈善机构的款项和其他宗教活动的经费的一大部分都是由巴扎商人捐赠的。在前现代的伊朗, 巴扎商人的子女几乎都进入宗教学校接受神学教育, 不少人因此成为宗教阶层的成员。乌莱玛和巴扎商人之间还有

① Mansoor Moaddel, *Clas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72 - 73.

② “效仿渊源”波斯语 “marja`- e taqlid”, 英语 emulation 或 source of imitation, 见 David Mennashri, *Post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Iran Religion Society and Power*, London Frank Cass, 2001, p. 13.

通婚的习俗。

什叶派乌莱玛依靠宗教税和瓦克夫宗教地产等财源,因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国家政治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sup>①</sup>在恺加王朝统治下,乌莱玛建立了独享的宗教统治地位,其力量得到增强。这也成为恺加王朝统治得以巩固的一大支柱。恺加王朝是部落后裔,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必先脱离部落的统治方式,使国王由部落领袖转变为国家领袖,并建立健全的官僚行政体系。乌莱玛阶层中有的和恺加王朝合作,依靠其支持以半官方的身份获得利益。有的宗教领袖只专注于学术研究;而一些宗教领袖更善于从政;还有的宗教领袖热心于赢得大众关注。<sup>②</sup>不同的政治力量或集团寻求不同的宗教精英作为各自的政治盟友。

乌莱玛是社会的特权阶层之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提高威望和维护其权威地位,宗教高层内部有激烈的竞争。什叶派乌莱玛分两个学派,阿克巴尔学派主张宗教要脱离社会和政治,而乌苏勒学派自19世纪以来与王权紧密结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流派。乌莱玛之间还存在民族、地区等方面的差别。师从渊源、所属学校、被同行的认可程度、资格辈分、财富基础等都对乌莱玛中的个人在本阶层中的地位产生影响。宗教领袖米尔扎·哈桑·设拉齐的威望和影响力远超过其他的穆智台希德,这是因为他吸引了更多的商人支持,拥有更多的资金。其家庭背景来自宗教和商人的结合,他的学生也长期接受商人的资助。随着其学派的扩大,自身的权威便得到增强。<sup>③</sup>

宗教阶层中存在两派对立的力量,一派以萨德尔(sadr)为首,另一派以穆智台希德为首。萨法维王朝以来,萨德尔是宗教机构的首脑,负责宗教事务和宗教基金的管理。萨德尔在司法方面拥有很大权力,还拥有巨额资产。萨德尔是宗教首领,通常被授予伊玛目杰玛耶赫的头衔,较低的头衔还有谢赫伊斯兰、穆塔瓦里、哈菲兹、穆达里斯(mudarris)、纳马兹

① Stephen C. Poulson, *Social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Iran Culture, Ideology, and Mobilizing Frameworks*,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p. 64.

② Stephen C. Poulson, *Social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Iran Culture, Ideology, and Mobilizing Frameworks*,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p. 67.

③ Stephen C. Poulson, *Social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Iran Culture, Ideology, and Mobilizing Frameworks*,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p. 66.

(pish namaz)、卡迪 (qadi) 等。以萨德尔为首的宗教群体本身是政府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成员都是国王任命的。

穆智台希德是脱离世俗政治之外的社会力量，他们被人视为离隐遁伊玛目最近的人，对教法有解释权和创制权。这一群体内部的教职高低是基于学识和什叶派信徒的支持而进行划分的，在这类群体中精神权威是权力的来源。两派经过长时间的争斗，至萨法维王朝晚期，穆智台希德的地位提高，超过萨德尔一派。

恺加王朝时期穆智台希德的权力继续增长，法斯阿里汗时期这一派力量达到极盛。萨德尔派以谢赫伊斯兰为首，在各大城市中是当地的首席法官，受到君主任命和资助。但 19 世纪之交，萨德尔派已经衰落。为平衡穆智台希德的力量，恺加王朝的纳赛鲁丁汗支持伊玛目杰玛耶赫，使其成为当地清真寺星期五礼拜的领袖人。伊玛目杰玛耶赫在主要的几个大城市中的权力开始增长。他们受政府任命，拥有瓦克夫地产，开始扮演萨德尔派的角色。第一任伊玛目杰玛耶赫是纳赛鲁丁汗的女婿。两派的对立和争斗因而再次出现，立宪革命中就有一派支持国王，这一派的领导人就是伊玛目杰玛耶赫。<sup>①</sup> 巴列维王朝时期，两派的争斗仍然存在，而有世俗倾向的伊玛目杰玛耶赫一派更有优势，因为国王实行工业化和西化改革削弱的主要对象是穆智台希德，国王也有意识地支持世俗派的宗教力量反对穆智台希德。

其次是商人阶层。伊朗传统社会中，商人具有很高的声望和社会地位，这源自伊斯兰文化中具有崇商的价值观念，从经训中可以发现不少赞美商人的句子，先知对商业贸易有着极大的兴趣。圣训中也有不少先知赞美商人的记载：“信誉好的商人是先知和殉道者的朋友”；“在末日审判到来的时候诚信的商人将沐浴在安拉的荣耀之光下”；“商人是安拉的信使，也是安拉所信赖的人”<sup>②</sup>；等等。因此伊斯兰文化也是一种崇商文化。对穆斯林来说经商是最优的谋生之道。人们倾向于认为商人是他们中最虔诚的人，是最安全也最能满足人们愿望的人，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受尊敬的人。

伊朗处于丝绸之路的商业要道上，具有发达的商品生产体系。早在前

① James A. Bill, *The Politics of Iran Groups, Classes, and Modernization*, Charles E. Merr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 24.

② Mansoor Moaddel, *Clas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04.

资本主义时代伊朗商业已经非常繁荣,古代波斯与拜占庭、巴格达等城市存在密切的商贸往来,与阿富汗、土耳其、印度和中亚等国家的商业往来也非常密切。近代伊朗主要与英国、俄国、印度进行贸易,1800~1914年伊朗外贸额增长了12倍之多。<sup>①</sup>

大商人群体在伊朗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很高。从事批发贸易的大商人(tajir)是长途、大型的国内外贸易中的主角,这一群体控制着城市的主要经济活动。在地方的金融活动中,大商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政府的财政要靠他们来保证。但经济地位并非商人阶层形成的唯一重要的因素。伊朗商人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被视作居住于城市的贵族。在城市中,商人和宗教精英穆智台希德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什叶派伊斯兰传统文化是商人阶层形成的重要因素。

最后是作坊主。在手工作坊内部,作坊主雇用家庭劳动力,与学徒之间大多也是家庭亲属关系。学徒可以成长为新的作坊主。19世纪伊朗城市中行会制度严密,许多手工业行会都有自己的巴扎,作为他们处理内部事务的地方。手工业行会组织联合的程度很高,在城市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行会具有管理和税收两项职能,行会选举会长和负责收缴会费,税率由行会和政府共同协商制定且长期固定。商品的定价由行会在月初确定。行会在内部事务上具有司法裁判权,处理会员内部纠纷,避免行会内竞争。行会对外垄断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维护本行会经济利益。行会会长多采用世袭制,会长由行会推选但由政府批准和任命,因此受后者控制,与政府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 (三) 传统中产阶级的形成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明给伊朗带来了公路、铁路及电报网等,再加上报刊的发行、邮政的运行,人们的交往能力增强了,各中心城市的距离拉近了。国外工业品的大批进口使国内贸易增加,伊朗农产品出口的日益增长改变着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农业开始商品化,逐渐形成的国内市场吸引着地方商人,这也加强了城乡联系。出口商、放贷商与农村的联系

---

<sup>①</sup> Mansoor Moaddel, *Clas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03.

加强了，民族资本得到发展。伊朗传统社会的等级结构在社会群体流动的冲击下开始松动，社会群体间的横向联系开始加强，从而超越了地域、民族和教派等因素的分隔。伊朗传统社会分散、隔离的状态开始被打破，巴扎商人和手工业主逐渐向跨地区、跨民族、跨教派的方向发展，最后转变为全国范围的力量。

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加强渗透，西方工业产品的倾销对伊朗本土工商业形成猛烈的冲击，伊朗商人在国内市场中逐渐失去原有的地位，他们处于外国资本的支配之下。民族工业也遭到重创，有不少传统手工业逐渐消失。巴扎商人和作坊主的生存受到威胁，但恺加王朝不能给予他们必要的保护。为了共同对付外国资本和恺加王朝间的联盟，二者走向联合。巴扎商人和作坊主原本就有紧密的经济联系，且以什叶派宗教意识形态和伊斯兰文化价值观为共同的纽带，因而在政治上有很强的活力。城市中的乌莱玛阶层是一支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该阶层与巴扎商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乌莱玛生存和发展的大部分经济来源是巴扎商人提供的，前者又为后者提供政治庇护。同样，乌莱玛和作坊主之间也存在紧密的联系。乌莱玛、巴扎商人和作坊主形成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其中的某一群体因利益受损而发出抗议就会得到其他两个群体的声援。这在“烟草运动”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1891年4月纳赛尔丁国王向英国商人塔尔波特出让烟草专营权的事件引发了设拉子市巴扎商人的抵制行动。这一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伊朗各主要城市，德黑兰、伊斯法罕、大不里士、马什哈德、加兹温、亚兹德、克尔曼沙阿等城市都爆发了抗议运动，抗议运动不断扩大，进而形成全国范围的总罢市。运动是由宗教领袖领导，大阿亚图拉以法特瓦的形式宣布全国性禁烟运动<sup>①</sup>，禁烟运动也得到境外宗教中心卡尔巴拉的宗教领袖的支持。通过宗教的纽带，商人与外国资本的冲突转换成了穆斯林反对外国资本入侵的斗争，从而动员更多的社会群体反对外部力量。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富汗尼和在伦敦的马尔克姆汗也声援禁烟运动，此外也有沙俄等外部力量支持伊朗国内的烟草运动。德黑兰发生大规模街头抗议，王室地产上的

① 一说此禁烟的法特瓦是一群商人伪造的，由于宗教领袖支持禁烟，态度谨慎，没有对法特瓦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参见 Mansoor Moaddel, *Clas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13。

农民和手工工人也参加了抗议运动,这样各种社会力量一起行动形成空前的压力,最后迫使国王就范。

从烟草运动开始,伊朗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局部的政治运动能够发展成全国运动。“烟草运动”中,巴扎商人、作坊主和乌莱玛被动员起来,突破民族、宗派、语言、地域分隔的局面,第一次结成全国性政治联盟。运动中,传统中产阶级得到现代中产阶级的支持,最终取得胜利,这显示出阶级形成后在政治动员和组织形式等方面的优势。伊尔万德·阿布拉赫马说:“19世纪后期伊朗两大阶级已经形成,旧的社会结构解体,小资产阶级与乌莱玛的阶级意识逐渐觉醒,形成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sup>①</sup>

传统中产阶级形成后对伊朗现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现代思想的挑战,伊斯兰社会需要创新传统文化或发动改革运动来促进社会变化和进步。宗教阶层是传统中产阶级中一支较早觉醒的力量,进步的乌莱玛企图在伊斯兰和现代思想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努力使伊斯兰政治理论与立宪政治思想相融合。通过改进伊斯兰实现伊斯兰和现代性的统一,伊斯兰现代主义开始发端。伊朗立宪革命时期,塔巴塔巴伊、纳伊尼、卡沙尼等宗教知识分子将什叶派政治理论与立宪政府观念相协调。宗教阶层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保护商业和民族工业的安全和发展,结束外国资本对本国的控制等。

#### (四) 现代中产阶级形成

恺加王朝后期,伊朗社会中逐渐形成第一代知识分子,其活跃的时间是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是伊朗现代化改革的产物。伊朗在第一次伊俄战争(1804~1813年)中遭到惨败,被迫签订《古利斯坦条约》,丧失大片国土;在1828年第二次伊俄战争中再次失败,签订的《土库曼恰伊条约》使伊朗丧失了领土、司法及海关主权。对俄战争的失败促使恺加王朝着手实施改革,改革最先在军事、工业和技术等方面展开,以此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加强军队,伊朗采用军事教程和语言

---

<sup>①</sup> Ervand Abrahamian, “Factionalism in Iran: Political Groups in the 14th Parliament (1944 - 1946),”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4, 1978, p. 23.

教材，成立军校和翻译学校，同时西方文学、史书和医学典籍也传入伊朗，政府还创办官方报纸《时事报》等，并发行杂志、出版书籍。19世纪中期伊朗现代学校开始出现，接受现代教育的毕业生和留学生、职业外交官等群体成为最早的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思想和现代理性的传播，伊朗社会中贵族、王室成员、公职人员、商人和乌莱玛等群体最先接受新的观念和思想，其中受到思想启蒙的成员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新的来源。该群体不乏社会上层成员，如改革派的政府官员埃米尔·卡比尔和阿敏·道拉等，甚至还有开明的皇室成员，如阿巴斯·米尔扎等。现代知识分子与王室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不依附于王权，要求改变落后现状，实行政教分离和引入西方民主制度，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

现代知识分子开办报刊，方便了思想交流。1875年加拉勒·大不里兹创办《星报》(Aktar)，1890年马尔克姆汗在伦敦创办《法言报》(Qa'nun)。伊朗人还在开罗创办《智慧报》(Hakmat)，在印度创办《团结报》(Kaghai-I Ittifaq)等。<sup>①</sup>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抨击专制王权，宣扬民主、改革、宪政和法治等思想，起到了传播新思想和开启民智的作用。还有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文学创作，他们强调民族主义，并向专制王权发起挑战，要求改变腐败和低效的官僚体制，他们还关注社会的衰退现象。知识分子由于成员来自不同的群体或阶层，该群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但他们都具有现代教育背景和新思想，都有明显的西化特征，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该群体在唤醒民族意识、伊朗现代化的启动及促进社会变革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纳赛鲁丁汗时期(1848~1896年)，工矿业、银行业、铁路交通、公共服务等现代行业开始出现，现代化的发展需要现代教育为其培育和输送人才。恺加王朝开始教育改革，建立了第一所世俗学校“大学堂”(Dar-fonun)以培养现代化人才。<sup>②</sup>1867年大不里士成立第一所现代小学，1901年德黑兰已建成7所小学，设拉子、马什哈德、拉什特和布什尔等各有1所小学。1910年伊朗国内小学增加至113所，其中1/3是女子学校。1906~1922

① 王泽壮：《阿里·沙里亚蒂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第35页。

② Hossein Godazgar,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Factors on Educational Change in Iran Islam in Policy and Islam in Practice*,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8, pp. 83, 84.



年伊朗小学教育发展较快,农村也开始出现小学。<sup>①</sup>为适应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1898 年德黑兰还成立了私立初中,主要课程有波斯语、历史、宗教、数学、伦理、几何、艺术等,学制为 6 年。同年德黑兰成立高中尼扎姆(Nezam),可以为军队输送专业人才。1911 年立宪政府的教育部也成立了国立小学和中学,都采用法国教育模式,课程有世界历史、阿拉伯语、语法、文学、地理、历史、写作、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药学,学制为 6 年。高中阶段学习初等经济学、动物学、几何等。伊朗现代高等教育也在发展,20 世纪初伊朗外交部、农业部、教育部、司法部等部门也分别建立大学,当时首都有 6 所大学,1934 年合并为德黑兰大学,坐落于首都郊区的卡拉季,开办有文科、理科、教育、法律、医学和农学等专业。<sup>②</sup>

伊朗接受现代教育的人主要来自工匠、政府官员和富商等家庭,现代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有的留校任教,还有的出国深造。这一时期回国留学生也增多了,他们从事现代教育,开设新课程。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壮大起来。19 世纪 70 年代后,欧美传教士在伊朗建立教区,开办教会学校和女子学校,此外还开办语言学校,如法国的联合法语学校和英国清教徒开办的语言学校等<sup>③</sup>,这也是伊朗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增长的一个因素。

知识分子是伊朗社会中思想启蒙的导师。他们提倡学习西方,主张从西方文明中吸收进步因素以改变伊朗的落后面貌,其代表人物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他认为传统知识已经落后,应通过科学、理性和现代先进技术使伊朗走上独立和富强。这一时期进行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有提倡自由和权利的塔莱布夫,还有用西方哲学重新释读前伊斯兰文化的米尔扎·克尔曼尼等。

知识分子也是社会改革的引领者。其代表人物伊朗经济学家马尔科姆汗,受土耳其坦齐马特改革的启发,主张首先在司法和行政等方面进行改革,并在军队、教育、税务和金融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改革。马尔科姆

① Hossein Godazgar,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Factors on Educational Change in Iran Islam in Policy and Islam in Practice*,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8, p. 86.

② Hossein Godazgar,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Factors on Educational Change in Iran Islam in Policy and Islam in Practice*,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8, pp. 85, 86.

③ 王泽社:《阿里·沙里亚蒂思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第 47~48 页。

汗提出“殖民有益论”，反对闭关锁国求独立的方法，主张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他向米尔扎·侯赛因汗请求进行变革。马尔科姆汗的开银行、修铁路、办学校等主张都得到实施，1876年恺加王朝邀请奥地利专家修建造币厂，1878年一座现代化的货币局在德黑兰成立。<sup>①</sup>此外，在大不里士的阿兹尔知识分子创办了突厥语期刊《知识财富》，其代表人物阿里汗等都是接受西式教育的现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德黑兰的知识分子群体组织学社，还在首都开办了55所世俗中学，其领导人是什叶派教师摩塔卡勒敏，他也是阿富汗尼的追随者，要求进行现代化改革。

知识分子依靠末代王朝的专制君主推行改革是无法成功的，因为改革遭到了来自贵族和保守的乌莱玛的反对。19世纪80年代改革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开始转向革命。他们联合宗教阶层，并将斗争的阵地从国家机构转向激进的新闻媒体领域。知识分子开始提出宪政主义，代表人物有赛义德·杰玛尔（Seyyed Jamal）和阿胡德·裁德（Akhund Zadeh）等。赛义德·杰玛尔反对专制统治，强调公民基本权利及言论和选举自由，要求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但他又强调伊斯兰法则的实行，议会不能成为立法机构，只有上帝才具有立法权，议会的职责是监督伊斯兰法的执行。<sup>②</sup>这类知识分子都是宪政主义的鼓吹者，他们竭力主张将伊斯兰与现代宪政相结合。他们认为伊斯兰在规范个人行为及动员大众反对西方入侵的斗争中是唯一有效的途径，因而致力于从经典信条中引申出现代科学的法则。

宪政主义的主张遭到阿亚图拉法兹勒·阿拉·努里（Fazl Allah Nuri）的反对，他认为立宪政府与伊斯兰是不兼容的。阿兹尔人（伊朗阿塞拜疆族）艾哈迈德·卡斯拉维也反对宪政与伊斯兰的结合，卡斯拉维虽然也出身教士职业，但他与努里有很大差别，他是现代世俗主义的鼓吹者，他认为部族、语言、教派等方面的问题是伊朗落后的根源。卡斯拉维批判宗教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宗教导致人民各种不幸、冷漠和自大，阻碍了改革和社会进步，宗教机构贻害民众，是造成伊朗落后和不发展及各种不幸的根源。宗教被西方国家利用，以实现其政治目标，他指出这样的伊斯兰只是打着安拉的幌子。卡斯拉维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二三

① 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等著《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第235页。

② Asghar Fathi, "Ahmad Kasravi and Seyyed Jamal Waezon Constitutionalism in Ira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9, No. 4, 1993, p. 708.

十年代阿里·阿赫默德、哈里尔·马勒克(Khalil Maleki)等都承袭了卡斯拉维的思想成为世俗主义知识分子。

烟草运动结束后,恺加王朝政策开始转向政治高压,日渐远离“危险”的改革,如限制现代教育的发展,减少与西方国家的联系等。恺加王朝在20世纪初实行了一些自由主义政策,这为政治反对派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许多革命组织,如德黑兰就有30多个拥护宪政的政治组织,此外还有行会、宗教学生、专业技术人员、少数民族等群体的政治社团等。各省议会的议员大多由巴扎商人组成,他们发展为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权力中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知识分子群体成长为一个独特的阶层,其人数规模较小、内部成分复杂。知识分子群体中领取工薪的专业技术人员逐渐增多,群体呈现职业分化的特征,因此被称为职业中产阶层,该群体因接受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而被称为现代中产阶层。恺加王朝晚期,激进报刊大量涌现,由6家增加到100多家,中产阶层的政治组织得到发展。较大的革命组织有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人文学社(Society of Humanity)、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ittee)、秘密会社(Secret Society)和秘密中心(Secret Centre)等。创建于大不里士的秘密中心由12名激进知识分子组成,成员有商人、公职人员、知识分子等,领导人是谢赫派商人阿里·卡尔巴拉,与传统商人不同,他熟知法国文学和西方哲学。秘密中心的政治要求包括进行社会改革和改善工人处境等。

成立于沙俄境内高加索地区的巴库的社会民主党是由巴库当地的伊朗人组成的,其社会基础是巴库油田的伊朗工人,党的领导人是伊朗的阿兹尔人教师纳里姆·纳里马诺夫,成员多是阿兹尔人知识分子。人文学社的建立者阿巴斯·库里汗曾任司法部的高级官员。学社的成员多来自社会中上层,该组织要求政治平等和自由,主张通过社会改革促进民族进步和发展。

革命委员会于1904年在德黑兰市郊区成立,其最初的成员是76名激进知识分子,其中有15名公职人员、8名教师、4名作家、1名医生、14名宗教人士、1名酋长、3名商人和4名手工业主等。他们都是受过世俗学校教育而熟悉西方制度文明的,且大多数精通外语,深受阿富汗尼、马尔科姆汗思想的影响。该组织成员年龄为40~50岁,来自贵族家庭的有3人,来

自乌莱玛家庭的有 21 人，来自公职家庭的有 7 人，来自巴扎商人家庭的有 8 人。<sup>①</sup> 他们主张向宗教阶层寻求支持，争取宗教阶层的官员及军官当中的自由派，通过媒体传播立宪民主思想，主张实行法治和社会公正。

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中也形成了政治组织秘密会社，该组织成立于 1905 年，属于温和改革派。秘密社会的成员向《古兰经》宣誓接受马赫迪思想，尊重乌莱玛的权威和实行伊斯兰法，他们反对压迫，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和行政改革，中央向地方分权。“秘密会社”与首都的穆智台希德赛义德·阿布杜拉·巴哈巴哈尼和赛义德·穆罕默德·塔巴塔伊有密切关系。伊斯法罕商人还成立了伊斯兰公司，它是首个全国范围的组织，提出培育现代工业、保护传统手工业和争取国家独立等主张。

### 三 中产阶级联盟与立宪革命始末

#### (一) 中产阶级联盟的形成和立宪革命运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伊朗社会中孕育出传统和现代两类中产阶级，两者各有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传统中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对国家依赖性较小，经济上较为独立，政治上传统、保守，具有很强的伊斯兰性。传统中产阶级反对社会革命，但又追求民主和自由，因此既想革命又容易妥协。现代中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其所具有的专业技术和管理资质使其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一种“自治”地位。现代中产阶级是脑力劳动者或称“白领”工人，其文化程度较高，深受西式世俗教育的影响，有世俗化倾向，倡导激进的社会革命。两者在社会文化和习俗方面，在生活习惯、衣食、娱乐、语言等方面差别很大。

尽管传统和现代两类中产阶级差异很大，政见存在分歧，但两者在推翻恺加王朝和实行宪政等方面达成一致。革命委员会的马赫迪·马勒克赛德说：“如果恺加王朝能代表本民族利益和抵制外部力量渗透，其统治就会得到伊朗社会力量的支持。但它出卖国权，不能担当民族利益的保护者，在共同的外敌面前继续实行分治的老办法，社会动荡的大潮终将打翻整个

<sup>①</sup>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78.

航船。”<sup>①</sup> 中产阶级对王室腐败、现代化速度过慢等现状极为不满，产生了改造伊朗社会的强烈愿望。他们要求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参与政治，共同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促使巴扎商人、手工业主、乌莱玛和知识分子等社会力量走向政治联盟，中产阶级的联盟正在形成革命之势。

经济危机是政治革命的导火索。1905年中央政府财政发生困难，推迟了还贷日期，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农业歉收也造成物价上涨，政府收入减少，政府增加税收的政策引起社会各阶层不满，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在穆哈兰月（muharram，伊斯兰教历1月）的宗教节日，巴扎商人首先举行抗议运动，要求政府停止损害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乌莱玛也加入运动，支持抗议的商人。政府的镇压反而导致运动规模扩大，库姆的宗教阶层也加入抗议运动，手工行会的业主和富商为运动提供经济支持。妇女团体和学生团体也都加入运动，示威者发表政治演说，反对恺加王朝的统治，世俗学校的学生提出实行共和政治。各地政要都向政府发出通电，要求撤换首相和召开议会。

社会各阶层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和召开议会的主张，抗议运动逐渐发展成为立宪革命运动。革命参与者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其中包括巴扎商人、学生、神职人员，以及公职人员。参与者包含了伊朗各民族和各教派。

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虽然仍支持王室，但保持沉默，并没有诉诸行动。王室成员中的保守派看到形势已经无法挽回，便劝告国王接受宪政。国王被迫让步，1906年8月5日宣布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1906年10月7日，伊朗第一届议会召开，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即《基本法》，这也是东方较早的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同年12月30日《基本法》由国王批准执行。《基本法》规定，成立上下两院，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在宗教法庭之外成立世俗法院；在各省和州设恩楚明（即委员会）；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成立由五名高级教士组成的监护委员会监督伊斯兰法的执行。<sup>②</sup> 立宪革命取得成功。革命委员会的马勒克裁德评价说：“没有传统中产阶级的参与，要结束旧秩序是不可想象的。”<sup>③</sup> 革命打破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城市中产阶级由此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其在社会中的整体地位得到提

①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74.

② 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等著《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第254页。

③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92.

高，对伊朗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7年颁布的《议会选举法》规定了六等选民（*tabaqat*）：王室成员、乌莱玛、贵族（包括显要人物 *ashraf* 和贵族 *a'yan*）、巴扎商人、资产 1000 土曼以上的地主、行会手工业者。议会在选举上实行选区制，总共 156 席中首都占 60 席（王室成员占 4 席，乌莱玛占 4 席，地主占 4 席，巴扎商人占 10 席，103 个行会占 32 席，低收入阶层被排除在外），其他省份占 96 席。<sup>①</sup>

立宪革命成功后，议会是权力机构，对条约、贷款等重大国事有最后决定权，对法律、条例、预算有批准权和监督权。第一届议会成员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巴扎商人和手工业主的代表占议员总数的 41%。<sup>②</sup> 议会中 26% 是手工业主，20% 是乌莱玛，15% 是巴扎商人，这三大传统中产阶级群体共占议员总数的 61%。<sup>③</sup> 议会拥有更多的权力，是伊朗多极政治结构中的一极。

第一届议会中保王派（*Mostabed*）是少数派，在议会中政治影响力不大。该派由王室成员、贵族、地主等社会上层构成。议会中的温和派（*Mo'tadel*）是多数派，社会基础是城市中产阶级，其政治影响力很大。温和派受到宗教领袖的支持，其领导人是富商。议会中的自由派（*Azadikhaw*）有 31 位代表，他们来自革命委员会、人文学社、大不里士谢赫派教区、德黑兰手工业主等。自由派多是知识分子，领导人是来自大不里士的坦齐裁德和德黑兰的亚赫雅·伊斯坎德尔。自由派在议会中的人数虽然少，但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注重与温和派合作，致力于推行成文法和世俗化改革。

中产阶级是保卫议会权力的主要社会力量。伊朗新任国王穆罕默德·阿里<sup>④</sup>与议会关系紧张，他欲借英俄武力来扩大王权。为迫使国王接受议会通过的基本法补充条例，巴扎商人组织运动支持议会，公职人员也参加运动，“中央社会”组织 5 万人的集会和 3000 人的武装保卫议会，社会民主党组织市民保卫议会。阿塞拜疆少数民族发起自治运动，成为与首都议会呼应的力量。1907 年 10 月 7 日国王被迫在基本法补充条例上签字，他还任

①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86.

② Mansoor Moaddel, *Clas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14.

③ Mansoor Moaddel, *Clas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14.

④ 1907 年 1 月 8 日穆扎法尔丁国王病逝，穆罕默德·阿里继位。

命自由派的纳赛尔·穆尔克为首相。国王还加入人文学社以示进步,至1908年人文学社成员中有一半为王室成员。

立宪革命后伊朗进入议会政治时期,这是伊朗社会发展的一次飞跃。伊朗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政治变革走在了前列,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后发现代化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即政治现代化先行。但提倡议会民主的中产阶级规模仍然很小,社会上层和下层在政治上大都是保守的,他们站在议会民主制的对立面。所以要想维持政治革命的成果,中产阶级面临强大的阻力。

中产阶级是维护立宪革命成果的重要力量,曾多次击败保王派的复辟活动。但中产阶级的内部分歧严重削弱了其力量,立宪政府最终在沙俄的干涉下被颠覆,伊朗政治向现代君主制过渡,礼萨汗在各阶层的支持下建立了巴列维王朝。

## (二) 中产阶级内争和立宪民主制危机

立宪革命后国王权力受到限制,议会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是民主政治的载体之一,也是中产阶级改造社会、取得进步与发展的主要阵地。伊朗在政治意义上实现了转型,但议会政治的基础并不牢固,政治转型面临诸多困难。

首先,中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虽然在第一届议会中商人和小企业主等居多,但伊朗缺乏大工业,也没有成熟的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中的主要群体仍是从旧制度中发展而来的带有传统性和保守性的巴扎商人和乌莱玛,他们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力量逐渐呈下降趋势,小企业主群体由于缺乏政治领导能力其力量逐渐受到削弱。中产阶级是伊朗最激进、最具革命性的群体,但力量薄弱,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相反,保守力量比较强大,社会力量仍带有旧制度的痕迹,反对革命的部落仍然强大,王室成员、贵族和大地主在政治中仍占重要地位,国家行政部门的高级职位几乎全部由社会上层把持。社会下层民众和宗教保守派也是议会民主制的反对力量,他们与立宪政府处于对立状态。旧的社会力量在新制度下继续存在,且不时地对新制度的生存构成威胁。

其次,中产阶级内部分歧矛盾重重。伊朗第一代知识分子中有很多是少数民族,其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与广大穆斯林群体有很大差别,被大多数社会群体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因此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现代中产

阶层批判本土传统文化，并视宗教为发展的障碍，他们的世俗化和反宗教倾向引起传统中产阶级的疑虑。传统中产阶级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对抗社会革命，逐渐向统治精英靠拢。传统和现代两类群体的内争削弱了中产阶级的力量，议会的地位动摇了。

最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量很弱。伊朗民族国家仍处于幼年时代，北部和西北部如吉朗省和阿塞拜疆省兴起了自治运动。其他各省也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地方部落叛乱频发，中央政府难以驯服。少数民族分离运动、各省自治运动都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伊朗还面临英俄等外部势力的入侵。

由于农业歉收和物价上扬，议会成为保守力量攻击的对象。宗教保守派开始转而支持王室，他们召唤毛拉和神学院学生成立保守政治组织，以保卫伊斯兰秩序的名义反对议会。以谢赫·法兹勒·努里为代表的保守乌莱玛批评自由派是“受到亚美尼亚的无神论者马尔科姆汗影响而正在走向雅格宾主义”的人。<sup>①</sup>保守力量聚集在王权周围，妄图复辟君主制度，形成了反对议会的阵营。部落武装发动叛乱，相继加入保王党阵营，城市下层民众也支持国王。诗人马勒克·巴哈尔说：“上层和下层都支持国王反对议会，仅仅中产阶级仍然支持立宪政府。”<sup>②</sup>

1908年2月，穆罕默德·阿里国王与议会矛盾激化，他调集武装力量驻扎于议会广场，这威胁到议会的安全。恩楚明成员和费达伊（敢死队）武装及议会中的左派议员占领了议会大厦和附近的谢巴赫·萨拉尔清真寺，两者形成对峙。德黑兰的巴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政治组织“行会社团”组织了7000名武装志愿者以保卫议会。但国王勾结英俄，于1908年6月23日发动武装政变，俄国控制的哥萨克旅参与了政变。<sup>③</sup>立宪派和武装志愿者无力抵挡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国王复辟取得暂时成功，议会也遭到解散。

但身处伊拉克宗教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宗教领袖反对国王复辟。德黑兰之外的北方各省的省会如大不里士、伊斯法罕、拉什特等地的中产

①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95.

②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96.

③ 冀开运、蔺焕萍：《二十世纪伊朗史——现代伊朗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第43～44页。



阶层力量相对强大，是反对国王复辟的主要力量。阿塞拜疆省知识分子群体相对比较强大，许多是阿兹尔人和亚美尼亚人，该省立宪派成立省议会作为权力机构，还成立了省临时政府。立宪派来自谢赫派教区和亚美尼亚教区的中产阶级<sup>①</sup>，他们成立武装组织费达伊，成员多来自谢赫派教区中产阶级；领导人萨达尔汗和巴盖尔汗<sup>②</sup>出身于城市帮派（luti），是阿米尔教区和卡班教区的卡达胡达。阿塞拜疆临时政府成为革命大本营，卡斯拉维评论道：“大不里士就像法国革命中的巴黎，社会下层是推翻国王的原动力……伊朗经历了动荡、混乱和恐惧的时期。”<sup>③</sup>

除阿塞拜疆外，其他北方省份的中产阶级也都在当地组织起来，向首都进军。伊斯法罕的巴赫蒂亚尔部落得到德黑兰革命委员会支持，在占领伊斯法罕后向首都进军。布什尔的立宪派接管了该省的权力机构。克尔曼沙阿的立宪派驱逐保皇派，掌握了议会和省政府。马什哈德城市中产阶级也掌控了当地政权。各地武装都向首都进军。此外，毗邻伊朗北部的巴库地区社会民主党也在组织革命武装。

拉什特的革命组织是由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除穆斯林外还有不少亚美尼亚人，首领为谢别赫达尔，他组建的革命武装得到高加索社会民主党武装的支持。谢别赫达尔在里海沿岸省份地方长官的支持下，1909年5月带领武装和马赞达兰农民队伍向首都进发。1909年7月13日，谢别赫达尔进入德黑兰，废黜了穆罕默德·阿里国王，另立艾哈迈德·米尔扎为国王，出现了地方各省联手主宰首都命运的局面。立宪派入主德黑兰后主张再建议会，1909年11月17日，第二届国民议会正式成立，行政内阁主要由自由派贵族担任。该届议会取消了选民的资格限制，因此选举权扩大了，并增加了地方代表以平衡各选区名额，此外还增设宗教少数派代表的席位。至此，自由派的政治改革要求基本上都实现了。

第二届议会中，中产阶级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议会中代表现代中产阶级的政党为民主党，该党受到城市中产阶级及世俗学校学生的支持。民主党代表多来自伊朗北部，在议会中共有27名代表，其中阿塞拜疆13人、呼

①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97-98.

② 冀开运、蔺焕萍：《二十世纪伊朗史——现代伊朗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第44页。

③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98.

罗珊2人、德黑兰7人。从职业上看，政府公职人员有8人、记者有4人、乌莱玛有5人、地主有1人、医生有1人。议会中的温和保守党有53人，受城市传统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大多是北部省份的土地贵族和传统中产阶级，有13名乌莱玛、10名地主、9名巴扎商人、10名公职人员、3名部落酋长。<sup>①</sup>

### （三）立宪革命失败

伊朗政治转型中的问题仍未消除，议会民主制的生存面临保守阵营的威胁。中产阶级无法得到社会下层的支持，因为村民和城市下层都将立宪革命者视为异端，他们选择和保守的乌莱玛站在了一起。伊朗农村社会结构仍原封未动，广大的农村地区、部落和城市下层劳动群众深受保守派和上层的影响及控制。保王派以大不里士的伊玛目杰玛耶赫为首，其在组织下层民众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沙赫沙维部落也加入保王派阵营，保王派中有不少部落首领、地方贵族和大地主，是强大的地方势力，控制着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保守阵营的力量在增强。

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存在结构性问题，传统中产阶级和现代中产阶级政见分歧仍然突出。民主党和保守党在首相人选、土地改革、税收、世俗化、妇女及非穆斯林成员的社会地位等问题上形成尖锐对立。<sup>②</sup> 民主党是自由派，要求通过扩大选举权范围吸纳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政治，以此扩大议会政治的基础。他们主张削减王室支出和裁决王室随员，在司法体系方面世俗和宗教分离，支持妇女运动，等等。其主张引起保守党不满，保守党维护君主立宪，保护私有权和基本人权，要求实行伊斯兰法和发展宗教教育，主张维持现状，反对进一步改革。

激进派在议会中人数较少，他们反对王权，也反对宗教干预政治。激进派批评宗教阶层迷信、狭隘、妥协、教条至上等，要求乌莱玛退出政治。保守党则谴责激进的政治组织是宗教异端，是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中产阶级内部不同派系的分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城市中产阶级想要通过议会民主制遏制王权并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将面临诸多困难。

<sup>①</sup>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03 - 105.

<sup>②</sup> Ervand Abrahamian, "Factionalism in Iran: Political Groups in the 14th Parliament (1944 - 1946),"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4, 1978, p. 24.

1911年7月,伊朗废王穆罕默德·阿里在沙俄的支持下率领3万雇佣军在里海沿岸登陆,向德黑兰推进,但被击溃。同年11月,沙俄出兵入侵伊朗北部,12月保王派在德黑兰发动政变,恺加王朝复辟。立宪派的据点议会大厦被占领,成员遭到捕杀,自由派报刊被查封。1912年1月,俄军攻陷革命派最后据点大不里士<sup>①</sup>,立宪革命在沙俄和伊朗保王派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 结 语

前现代阶段,伊朗城市中的乌莱玛、巴扎商人和作坊主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中等地位,具有中等收入水平和较高的社会声望。而其中人数较少的高级乌莱玛和大富商,属于社会上层。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外部力量的入侵,伊朗社会经济和群体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中产阶层逐渐形成,烟草运动后中产阶层在全国形成规模。

中产阶层对伊朗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中产阶层中的进步乌莱玛提倡伊斯兰现代主义,而现代中产阶层力主西化改革,这成为伊朗社会前进的推动力量。一方面,传统和现代两类中产阶层联手发起立宪革命,革命派参考比利时宪法模版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体结构,议会成为权力机构,国王权力受到制约;另一方面,什叶派被遵奉为国教,由五位教士组成宗教委员会以监督伊斯兰法的执行,宗教阶层以监护人的角色载入了宪法。立宪革命中,中产阶层对国家政治的架构既体现了传统中产阶层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又包含了现代中产阶层立宪主义思想和民主政治的要求,因而立宪革命被视为伊朗政治现代化的起点。<sup>②</sup>此外,反对专制王权和追求民族独立也成为立宪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议会民主制是西方民族国家成功整合后建立的政治制度,伊朗超前的政治建构与落后社会阶级结构是脱节的。伊朗农业占整个经济体系的绝大部分,经济结构基本没有改变。人口结构方面,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例没有变化。伊朗社会下层及其教育状况改变很小,直到20世纪40年代全国平均识字率仅为5%左右,农村绝大多数人口仍是文盲。社会结构方面,

<sup>①</sup> 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等著《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第257页。

<sup>②</sup> 蒋真:《从西化改革到伊斯兰革命——当代伊朗政治改革与发展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84页。

最先接触西式文明和向现代转变的是社会中上层，下层的改变较晚，也最为困难。这一时期，伊朗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微量的、局部的，社会整体结构依然如旧。

社会上层和下层在政治上大都是保守的，他们站在议会民主制的对立面。虽然中产阶层形成并得到一定发展，但规模仍然很小，中产阶层建立的政权还很脆弱，王权、地主、保守的乌莱玛、部落及英俄等外部力量都与之形成对抗。其结果是建立于议会民主制之上的中央政府职能具有很大局限性，权威严重削弱，对内难以驯服反对力量，对外不能御敌。最终立宪革命被扼杀，中产阶层力量受到削弱。

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后，两代君主大力推进现代化，伊朗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中产阶层逐渐壮大，他们反对王权专制、反对外国资本的渗透，最终以伊斯兰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伊斯兰革命与立宪革命之间存在诸多历史渊源，两次革命的主体都是城市中产阶层；反对的目标都是专制王朝；伊斯兰革命中，中产阶层最初的政治设想仍是恢复立宪革命的政治模板；革命后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议会在国家政治中都占重要地位，1979年的伊斯兰宪法也与1906年的《基本法》大同小异。此外，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社会盛行平等主义，其思想源头仍来自立宪革命时期中产阶层反对王权专制和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激情。

中产阶层对伊朗政治发展的影响还远不止伊斯兰革命，其影响一直延续下去。自20世纪90年代初伊朗政治自由化以来，全面伊斯兰化的劲头减弱，社会文化领域的控制出现松动。1997年改革派的哈塔米当选总统后提倡民主政治和建立公民社会，伊朗开始形成一股政治改革的浪潮。改革的实质是在中产阶层政治架构的基础上对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调整，削弱宗教神权，加强民选总统的行政权及民选议会的立法权，以达到世俗和宗教的平衡。改革派仍以宪法为起点，从宪法中寻找政治改革的法理依据，强调宪法赋予的人民主权，提倡伊斯兰民主，要求政治多元化，反对毛拉专制和提倡多元性。未来伊朗政治改革的方向及政治发展的趋势仍在中产阶层政治架构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责任编辑：李福泉]

relationships with neighboring states. By contrast, the Arabian tribes have always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egalitarianism. While it is hard for them to build confederations, they are able to maintain their autonomy against empires, states, and other tribes.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regional states are symbiotic. The dynamic of tribe-state relations depends largely on what type of tribe and what type of state.

**Key words:** Egalitarian tribes; Hierarchical tribes; Great empires; Regional states

## Modern Waqf of Saudi Arabia with Medina as a Case

*Ma Yuxiu*

**Abstract:** The forms of Islamic charity are diverse, and their names are different. Waqf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a variety of forms of charity. It is not a religious obligation, but a philanthropic act, based on the Hadith, which Allah likes and Prophet advocated and practiced. Waqf is popular in the Islamic world, and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Islamic social development. As the most persistent charity in Islamic history, waqf widely existed in Arab and Islamic countries. The Holy Cities of Saudi Arabia have accumulated a huge number of waqf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While waqf play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role, there are also a series of drawbacks and shortcomings in need of reform.

**Key words:** Saudi Arabia; modern; waqf

## The Formation of the Iranian Middle Clas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Zhang Chao*

**Abstract:** Bazaar merchants, Ulama and handicraftsmen altogether constitu-

ted middle class of Iran urban society. Although their number remained not heavy, they were organized very well. Traditional middle class and the modern one gradually take shape with the invasion and the economic penetration from the West. The two types of middle classes both required reform and independence and finally they launched revolution to establish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ut the new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ould not deal well for either internal or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itional forces resisted new system. Because of the foreign intervention,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failed finally, but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architecture of the middle clas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futuristic political process.

**Key words:** Iran, middle clas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olitical transition

##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urkey's AKP Government

*Zhu Chuanzhong*

**Abstract:** Since 2002, the economic policies carried by Turkey's AKP government have been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govern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reas, AKP Government's policies include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policies on economic sectors and privatization policies. Finally Turkey's economy recovered from the crisis, despite the difficult structural problems. However from 2012 on, Turkey's economy fell into once again the cycle of growth and stagnation, and the ruling AKP government faced great challenges as well.

**Key words:** Turkey; AKP; Economic Policies

## The Swedish Gendarmerie in Anglo-Iranian Relations, 1910 – 1914

*Chen Li-Qiao*

**Abstrac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ritain and Iran both faced new at-